

Wen Ming
De Li Cheng:
Da Xue Ren Wen Du Ban

文明的历程

大学人文读本

■ 张有智 张焕君 ◎ 主 编 王志超 谢耀亭 ◎ 副主编

本书分为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两大板块。不是单纯地按照历史先后顺序做通史性的讲述，而是在兼顾历史进程的同时，以专题的方式突出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勾勒其时代特征与风貌。在确定专题时，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强调思想、制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让死板的知识鲜活起来；第二，重视文化史知识的普及与文化传承；第三，突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照应当代社会对文化的理解与需求。

为此，我们将全书分为22个专题。其中，中国部分13个，世界部分9个，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特长选择讲授。中国部分



在兼顾历史纵线的基础上，分别对先秦直到民国日常生活等加以介绍，旨在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的形成过程，从而确定自己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世界部分的专题，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世界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各种秩序的形成，从而明确自己对人类文明的宏观认识。各相关专题所探讨的问题，都必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并能采用最新学术前沿成果，形成自己的独到观点。其次，在学术表达上，尽量避免过于学术化的语言与论证方式，减少注释，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保证可读性。同时，针对教材的特点，我们



SEU 2631642

的学术思想、礼仪、文字、书籍、华夷之辨、民族心理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形成过程，从而确定自己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世界部分的专题，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世界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各种秩序的形成，从而明确自己对人类文明的宏观认识。各相关专题所探讨的问题，都必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并能采用最新学术前沿成果，形成自己的独到观点。其次，在学术表达上，尽量避免过于学术化的语言与论证方式，减少注释，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保证可读性。同时，针对教材的特点，我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631642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K103
156

文明的历程

大学人文读本

张有智 张焕君 ◎主编
王志超 谢耀亭 ◎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历程：大学人文读本 / 张有智，张焕君主编。—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2012.6重印）
ISBN 978-7-303-14343-6

I. ①文…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
青年读物 IV. ① K1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727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5 mm × 250 mm
印 张：32
字 数：56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策划编辑：祁传华 **责任编辑：**祁传华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毛 佳
责任校对：李 菁 **责任印制：**李 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前言

一、知识与素养：做人之道

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大学》，虽然不满两千字，但却被当做圣贤宝典，列为《四书》之一，读书人都要读，可见影响之大。《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说，念大学跟小学不同，不能只注意那些知识性、技术性的问题，而是要关注更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更大呢？当然是做人。要做人，就要先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在作者看来，人生下来都是具有善性的，具备做好人的条件。这个善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不学而能、与生俱来的，是光明的德性，即“明德”。但是生活中难免有险恶，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很有力量，再好的德性，稍微不慎，也会被遮蔽，被遗忘，就像蒙上灰尘。怎么办呢？佛家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经常擦洗，保持干净明亮，尘埃便不存在了。在儒家看来，这个擦洗并明亮的功夫，靠的就是大学教育来完成。通过教育，不断地学习与思考，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亲身实践，就能让那光明的德性光明起来，这就是“明明德”。不仅如此，还要推己及人，用自己的德性影响你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能脱离尘埃状态，一起光明起来，如同新生，所以接下来要“新民”。俗话说，做好人不难，难的是一生都做好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目标不够高远，毅力不够坚强。因此，要找准目标，奋力前行，持之终生，这就叫“止于至善”。短短三句话，不仅概括了儒家对人性的理解，而且明确了教育的本质与修身的重要。南宋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八百年间，从乡村私塾到京城的国子监、山林中的书院，这三句话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影响深远。

台湾作家龙应台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她在《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一文中写道：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有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你能说他没有知识吗？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这是一个本质的差别。知识是一个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识本体。

所谓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知识是外在于人的，可以记忆，也容易遗忘。但是人文素养却是深藏在人的内心，沉淀为日常习惯，转化为看待社会与他人的思维观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人之为人有深刻的认识，保有赤子之心，能够关怀他人，这是人文素养的“终极的关怀”，也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功能，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的差别，正是素养与知识、修身与技术、超越与实用的差别。“道”可以寓于“器”中，也可以脱离于“器”之外，似乎高远而缥缈，与柴米油盐无关，但失去了它，只拥有“器”的生活就会变得雷同、猥琐，缺乏目标，索然寡味。

如何实现知识性与人文性的结合，是一个时代的难题，尤其在功利的时代，更难被浮躁的心灵所理解。同样，在一切向西方看齐的所谓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民族自信，实现自身文化的转型，更是一个令人不堪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传统仍然与落后、愚昧、专制相连，仍然与民主、法制、科学绝缘，抛弃唯恐不及，怎能顽固守旧！但是正如科学的推进无法改变祖辈世代传承的基因，文化上的纽带又岂是说断就能断掉的？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群，看看他们的焦灼，听听他们的苦闷，我们又何尝有一日完全脱离了传统？进而言之，这样的批评与质疑之所以产生，既源于 20 世纪中国的国情，又源于我们对西方历史文化的断章取义，雾里看花。热情地从人家的树上摘取，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树下的土壤与气候，以为简单移植，就能落地生根。这样的谬误，只因为符合中国寻求“富国强兵”的宏大目标，似乎天然具有正义性，至今仍在人们的头脑中流转。这样的困境必须改变。

有鉴于此，当今国际高等教育的潮流也从最初的侧重学术性，逐渐转化为目前学术性与人文性的渐趋融合。这样的转化，本质是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所谓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今天的大学教育，无论就业如何艰难，都必须关注社会和个人对文化以及人文精神的追求，必须注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相互融合，这样它才能称得上是一所大学，而不是职业培训中心。通过人文素养的养成，不仅可以培养学生阅读、写作、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培养文化亲和力、社会责任心与价值判断力，激发学生对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对生命与自然的尊重和关爱，最终达到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实际上，目前美国、中国港台地区以及内地高校陆续开设的各类通识课程，目的也正在于此。

二、礼仪之邦的文化自信

20世纪40年代，抗战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民族存亡系于一线。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钱穆先生有感于此，写出《国史大纲》一书。日寇的入侵、战局的不利已然让他忧心如焚，而国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漠视甚至轻易地抛弃更让他觉出无限的悲哀。三百年前，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① 亡国之事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不过是改朝换代，中国还是中国；但是亡天下则大大不同，那意味着不仅朝代变了，而且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迎头斩断，虽然不至于严重到孟子在战国时看到的“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地步^②，但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没有源头活水，那就如同一个失忆游走之人，生存尚且不易，又何谈什么创新？因此，钱穆开篇就讲，凡是阅读本书的读者，都应对本国以往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只有如此，他才“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只有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多了，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③。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出于一种他所谓的“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还是因为“似

^①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长沙，岳麓书社，1994。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钱穆：《国史大纲》，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是而非之文化自谴”，认为中国历史毫无价值，近代以来又时时遭受外人凌辱，因而将自身所有罪恶与弱点全部诿卸于古人，拆墙拆屋刨祖坟，看似决绝新潮，实则是典型的文化不自信，数典忘祖，甚至不如只会糟蹋祖业的败家子。而且，钱穆看到，如果缺乏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国民对自己的文化毫无认同，即便国家实力提升，也不过形同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体现的仍然是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征服。这种状态下，借助国人的自戕，实现的是中国文化的萎缩与消灭，而非鼓吹西化者所说的文化转型与发皇。

反观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六十年前钱穆所期待的并未完全实现，相反，他担忧的前景却时不时地历历在目。我们对前辈学者的睿智与远见固然钦佩，但恰恰因为他的不幸言中，无论是考察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更强烈的感受则是忧虑。

古代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这让中国人倍感自豪。但当代中国人却常常因为在公共场合的粗鲁无礼被认为缺乏修养，这又让许多国人感到羞耻。自豪还是羞耻，根源都在礼仪。礼仪的存在与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是文明还是野蛮，是优雅还是粗野，意义不可谓不大。对于中国而言，百余年间，礼仪、儒学、传统文化，时而被打倒，时而被呼唤，打倒之时不乏留恋惋惜，呼唤声中犹有质疑批判。众声喧哗，头脑犹如跑马场，形形色色的思想学说、政治宣传旗帜挥舞，轮番驰骋，让人不免眼为之迷，心为之乱。

这一切，都跟屈辱有关。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史，是西方列强的征服史、殖民史，更是中国人的屈辱史、反抗史。至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改革、辛亥革命之后，在当时最为先进的中国人头脑中，都已经普遍接受了西风压倒东风的事实。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再需要耗神费力地去跨海翻江，来耀武扬威，洋人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乃至民主观念、卫生习惯，都日渐成为努力效仿的标准，唯欲其速，唯恐其迟。支撑此般事实的宏大理由是救亡图存的焦虑，富国强种的迫切，一切都显得正当而合理。睁开的眼睛一旦见到影影绰绰的光明世界，当初的黑暗就变得无比丑陋压抑，绝难忍受。于是，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秦政”，是大权独揽、赏罚由己的秦始皇们展现独裁的舞台；两千年的思想观念尽成“荀学”，是为了迎合专制者炮制出来的奴才思想；儒家成为“孔家店”，儒学成了统治者虐政愚民的帮凶，神道设教的渊源，礼仪之邦竟是哀鸿遍野，礼乐教化竟成“吃人”工具。矫枉必过正，正本还清源。于是，在一波接一波的呐喊声中，儒学终于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总根

源，承担起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的最终责任，遭人唾弃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历史却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一个举重若轻的华丽转身，就使得将近百年的武器之批判与批判之武器，羽毛般坠落在地，当年真诚或虚伪的声讨与愤怒，全变成不可思议的遥远记忆。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学热开始升温，从最初个别学者的研究开始，逐渐有了专门的国学刊物，进而有了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对国学的认可，逐渐超出学者的范围，政府进来了，于是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可以频频见到各级官员的庄重身影，数百所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相继成立；民间活跃了，于是各地有了设计、穿戴古代“汉族”衣冠的“哈汉”一族，学校开始举办源于儒家冠礼的成年礼，礼仪培训甚嚣尘上，现代私塾重现闹市，“读经”要从娃娃抓起，《三字经》、《弟子规》甚至四书五经都成为启蒙读物；《百家讲坛》火了，于丹的《论语心得》成为几百万现代都市人安抚焦灼心情的“心灵鸡汤”，各路英雄纷纷出马效仿，孔子几乎成了“大众情人”、“知心姐姐”。先贤们的奔走呼号，七八十年的严厉批判，领袖的高瞻远瞩，政治运动的深入肌髓，似乎都未曾发生过，当年遭人痛打的流浪狗，抖擞精神，又成了雄姿英发的“金毛狮王”，惹得万众瞩目。这样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倏尔变桑田，虽然在自然界并不罕见，但在人类这样以理性自诩的种群中，终究显得反复无常，令人诧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过：“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这句话可以用来解读近代欧洲对待传统的态度。当我们阅读欧洲启蒙学者的著作时，能够清楚感觉到他们对古希腊、罗马的神往和力图“复古”的激情。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复”希腊、罗马之“古”，近代欧洲之“兴”正是凭借这样的“复古”才得以完成。在成为世界文化标准的欧洲，复古似乎并不是什么过错，更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至于“古”里有哪些东西可以继承，他们似乎也并不担心。所以，即便到今天，有宗教信仰的西方家庭，孩子也要去诵读《圣经》，并没有因为那是两千年前的东西，是所谓奴隶社会、专制帝国的精神产品，就害怕毒害孩子的心灵，使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混乱，或者影响了什么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而正是这种自信使传统成为现代的动力，过去与现实连为一体，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自信，所以我们至今仍然害怕尊孔，害怕“读经”，警惕“封建流毒”，抨击专制阴魂，悠久的历史只是陈死人的流水账，丰厚的传统不过是“进步”途中的绊脚石，大包袱，一定要扔得远远的，踢得狠狠

的，让它不敢回头复辟，不敢露出踪影。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图画，才能革故鼎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百余年来的所谓“现代化”历程证明，无论我们如何歇斯底里地批判传统，在迎接西方的价值观时，无论我们是如何的真诚而热情，传统仍旧无法割断，西方文明难以照搬，我们也变不成“白皮红心”。既然如此，何不反躬自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异说纷呈，形成中国的“哲学突破”，与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两河文明相比绝不逊色。随后的两千年间，无论是国力强盛的雄唐盛汉，还是品位高雅的魏晋风度，抑或是唐诗宋词、宋明理学，无不显示出中华文明的成就与魅力。无法设想，一个民族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优雅的艺术、诗意的生活、深邃的思想，却长期处于专制与暴政之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这是何等荒谬的观点！对于一个敢于宣称自己最聪明，别人尤其是前人都是傻子的人，我们会称他为疯子或骗子；而对于那些坚信曾经造就辉煌和荣耀的先辈一直以来都生活在暴虐和愚昧之中而不自知的人，我们只能客气地说：非愚即诬，必居其一。

21世纪的中国，艰难崛起，大国声势，呼之欲出。但大国当有大国的气派，气派源于信心。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增长固然能够增强信心，但文化、精神等软实力上的自信更不可少。政府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如果想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弄清楚“复兴”要“复”的是什么。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回归古希腊、罗马，从中开导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精神。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复兴是回到百家争鸣的先秦呢，还是回到汉唐盛世？从中又可以学到哪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成为个人、社会、文明间交流的指导原则？或者说，如果当真相信“伟大复兴”可以实现，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待自己的传统、对待我们的先辈，态度上应该更显得谦卑而恭敬，相信历史上曾经有价值的创造仍可借鉴，相信共同的血脉使古今文化的贯通更容易，更亲切？

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明确，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对祖国五千年的文明有信心。然后静下心来，兼收并蓄，去粗存精，努力让我们当下的生活更雅致，更从容。传统中国，儒家最盛，但也不应一味盲从。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寻觅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我们就会重新解读仁义、中庸、忠恕与修身，体会古人为何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的良好风习，国家的和谐发展，从而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

三、本书的编撰思路

本书初版于200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三年多的使用中，我们通过课堂问卷、教师座谈等方式，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最主要的不足就是过于重视知识讲授，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忽略了通识教材应当具备的人文性。有鉴于此，我们在2010年暑假期间，重新设计教材内容，组织作者队伍，分头撰写，小组讨论，集中审稿，主编统稿。经过18位学者一年多的努力，才得以杀青。

与初版相似，本书仍然分为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两大板块，但不再单纯地按照历史先后顺序作通史性的讲述，而是在兼顾历史进程的同时，以专题的方式，突出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勾勒其时代特征与风貌。在确定专题时，我们遵循了三个原则：第一，强调思想、制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努力让死板的知识鲜活起来；第二，重视文化史知识的普及与文化传承；第三，突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照应当代社会对文化的理解与需求。

为此，我们将全书分为22个专题。其中，中国部分13个，世界部分9个，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特长选择讲授。中国部分的撰写，在兼顾历史纵线的基础上，分别对先秦直到民国、近代最能代表其时代特征的学术思想、礼仪、文字、书籍、华夷之辨、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加以介绍，旨在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的特征与演变，在增加文化史知识的同时，看到中国人一脉相承的心灵世界与生活场域，从而确定自己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世界部分的撰写目的则是帮助学生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理解在政治、文化、经济、民族等领域中各种秩序的形成，从而明确自己对人类文明的宏观认识，确定自己的世界观。因为有了这样的目的，专题的选定就不仅限于知识的介绍，而是时刻关注与现在的联系，对当下的影响。如介绍希腊、罗马，重点在于考察其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提供哪些资源；介绍基督教，则关注其对西方社会深远的影响所在；而在撰写民族主义、文明冲突与交往等专题时，更强调其形成的逻辑和对世界的影响。

在具体写作上，本书力求采用“亚学术”的方式撰写。所谓亚学术，首先是保证其学术含量，各相关专题所探讨的问题，都必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并能采用最新学术前沿成果，形成自己的独到观点。其次，在具体论证上，尽量避免过

于学术化的语言与论证方式，减少注释，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保证可读性。同时，针对教材的特点，我们在每个专题后都列出参考书目和思考题，有利于学生课下的自学。

本书成于众手，虽然多次改动，四易其稿，但是集体撰作的弊端仍难避免。加上作者多是青年学者，虽有热情，学殖仍待提高，不妥乃至错误之处，还请读者诸君海涵。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需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教分社饶涛社长和本书责任编辑祁传华先生，正是他们的热情鼓励和积极督促，本书才得以如期完成，而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职业操守，则为本书的小小成就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张有智

辛卯仲秋于河东赏雨轩

上编

下编

第十四讲 源头之源：古代近东文明

第十五讲 城邦悲歌：古代希腊文明

第十六讲 帝国迷思：古代罗马文明

第十七讲 暗夜舞者：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文明

第十八讲 驼铃声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第十九讲 两汉帝国：大一统的制度设计与实践

第二十讲 三国魏晋：乱世中的政治智慧与文化自觉

第二十一讲 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与国家治理的双重变局

第二十二讲 宋元明清：中国历史的最后一页与现代的开始

第二十三讲 现代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

第二十四讲 未来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目 录

上 编

第一讲 轴心时代：先秦学术思想概论	3
第二讲 礼仪之邦：儒家礼学与中国社会	25
第三讲 字里乾坤：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51
第四讲 翰墨春秋：中国书的历史演变	75
第五讲 吉光片羽：辉煌灿烂的上古文明	95
第六讲 魏晋风度：乱世中的自然与才性	114
第七讲 大唐雄风：中国人的盛世情怀	139
第八讲 天水一朝：两宋历史与文化	165
第九讲 象牙塔里：中西历史上的大学	189
第十讲 闲庭信步：传统中国的衣食住行	209
第十一讲 华夷之辨：近代文化的艰难转型	230
第十二讲 万物有灵：中国人的民间信仰	253
第十三讲 市民雏形：近代绅商阶层的兴起	274

001

下 编

第十四讲 源头之源：古代近东文明	295
第十五讲 城邦悲歌：古代希腊文明	318
第十六讲 帝国迷思：古代罗马文明	342
第十七讲 暗夜舞者：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文明	366
第十八讲 驼铃声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388

第十九讲 破茧成蝶：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410
第二十讲 变与不变：改良与革命之辩	432
第二十一讲 进退失据：民族主义的悖论	453
第二十二讲 和而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476
附录：本书作者简况及撰写分工	497

上
编

文明的历程

第一讲 轴心时代：先秦学术思想概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期”(Axial Period)的概念。^①他认为轴心期是“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从时间上看，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这段时间内，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面对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人类开始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雅氏“轴心期”的说法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人类经历之历程而言，人类文明集中于此阶段得以突破，此为历史之事实，因此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称这段时期为“哲学的突破时代”。近年来，我国学者多谓此阶段为“原创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期，是人类最重要的突破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文化，奠定了人类的文化模式，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轴心时代的智慧，是一种原创的智慧，也是一种影响力历久不衰的智慧。这样的时代，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目前为止仅出现过一次，后世的文化、文明皆是对其的继承、诠释和发展。

中国历史的“轴心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智者云集的时代。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成就霸业？管仲、晏婴、子产等一批治国能臣各自践行着自己的政治主张；诸侯争霸，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剑指前方，何人统率？孙武、孙膑、吴起等一批优秀军事人才应运而生；朝秦暮楚，合纵连横，分析天下形势，采取有力措施，苏秦、张仪、公孙衍、苏代等展现了乱世中的外交才华；周道衰微，名实混乱，辩者惠施、公孙龙倾其才学，辨名责实；群雄纷争，有赖实力，农业之国，水利先行，李冰父子、郑国、西门豹等人兴修水利，造福于民；此外左丘明著史警世，屈原、宋玉借文学的方式表达思想，医学家扁鹊，天文学家甘德、石申都有不朽的成就。最为重要者，此时出现了一大批思想

^①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7~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家，孔子、老子、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孟子、商鞅、庄子、关尹、列子、邹子、荀子、韩非子等，他们以深邃的思考表明了中国人对人类社会、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在乱世中构建着治世的方案，在伪诈中探索着人性的光辉，在平凡中展现了博大的胸怀，在逆境中坚守着高远的志向。他们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辟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学术的空前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迎来了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确定了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东方传统。

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

轴心期智慧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百家争鸣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结果之一。思想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环境，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变迁，导致西周时期的制度、文化发生变化，才最终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可以说百家争鸣正是思想家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回应。

1. 周制的破坏

西周实行的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遭到破坏。长期实行的制度，一旦在现实中频繁被破坏，则破坏此现象的观念当在此之前便形成，且在一定程度上为部分人接受。观念的形成非一蹴而就，而是由此前出现的破坏制度的因素汇集而成，这些因素往往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制度一旦确定，尤其是经过长期实行之制度，犹如一种潜意识中的价值标准，全社会人员会在无形中遵守，即在历史的惯性中遵守着制度并维持着社会的平静。如没有来自上层的一些“示例”，即使有出现破坏制度之因素，也较难出现破坏制度之事实，在有等级的和谐中，下层人员无法突破此无形的价值标准。人治社会，最高统治者本身存在于这个序列而又超越于这个序列，他们有“制”、“作”之特权，在他们身上少了一些传统价值的束缚，因此经常会因实际形势对传统制度做出一些改动，这些改动不论是否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其结果是对传统制度的冲击和破坏。这些改动与传统的制度观念不